

羅素論

程滄波

美聯社威爾斯彭德萊茲二月三日電：羅素和平基金會的一位人士今天早晨宣布：「和平鬥士並為當代大哲學家之一的羅素昨晚在北威爾斯寓所去世，享年九十七歲」。

這一條消息於二月四日傳到臺北，當我在晚報讀到這消息時，對這位先生的死，心中有各種感觸。羅素生在一八七二年，死在一九七〇年，在中國歷史的歷史上，他的出生相當前清同治十一年。這年在中國，是曾國藩病歿在兩江總督任上的一年，也是同治皇帝親政的前一年。所以照中國的算法，羅素先生的壽命已活到九十九歲，此在中外的學人歷史上是極少的例子。

像羅素先生那樣長的壽命，又像他一生複雜的經過，與毀譽的紛乘，在今天要寫一篇評論是相當困難的。也許有人聽見他的死，表示鬆一口氣，說一個時代怪物終算過去了；也許有人哀悼慘痛，說一代和平鬥士的隕落，是一個歷史性的損失。我想對一個時代人物的評論，籠統武斷地亂捧或亂罵，既不足以折服被批評者之心，更不是對歷史的忠實表現，與世道人心是沒有幫助的。至於論史，無論對人與對事的評論，籠統與武斷的亂捧與亂罵，尤其是根據一種教條式的偏見去捧人與罵人，是最容易而偷巧的事，但在學術上是最無價值，在有識者看來是不值一笑的。

一個人是有生命的，生命便會有盡。如果一個人當其生命到了盡頭，他的一生，對自己個人有交代，對時代歷史有交代，那個人便不是枉過一生，那便是偉大的人物。根據這個原則來評論羅素先生，他對自己是有交代的，對時代歷史也是有交代的。

在羅素自傳的「自序」及「書後」兩章中，他把他一生的總賬已經詳

細扼要地指出。他不但把總賬有一個總結，還把他一生的懷抱和行事有一個對照的結算。在他自傳首卷的序文中說：

我的一生被三種熱情所支配，那種熱情，一方面甚為簡單，同時也是壓倒的強烈。三種熱情——第一是對愛的熱望；第二是對智識的尋求；第三是對人類苦難的悲憫。這許多熱情，有如強風，臨着憂苦的深海，把我忽然吹到這裡和那裡。

講到追求愛，因為它能給我沉醉的快樂，使我有時樂於犧牲整個生命以求短時的快樂。其次，我為解除孤寂而求愛。又其次我為獲得上界的啓示而求愛。這許多我都認為在最後為我所求得。我以同樣的熱情去求知，我想瞭解人心，亦想知道天體，關於這一門，我有少許的成功。愛與知的昇華，扶我上升碧霄。但終因悲憫之心，使我重新降回地上。各種痛苦呼號之聲，滯留回復於我的心弦。饑荒中的兒童，暴政酷刑下的犧牲者，老無所告而子孫視為忿怨之負擔。孤寡貧窮及痛苦的世界，對人類生活形成一種諷刺。我想去減輕這種罪惡，但我未能，因之我同感痛苦。

這是我的一生，我感到是值得活的一生。如有機會，我很欣然再度活過一生。

過去我讀過多少中外名人的自傳，像羅素先生那樣清清楚楚把自己一生的賬，刻畫鉤稽，並且結算得絲毫不舛，真是難得。就羅素先生在一生總賬中的決算書，加以考核，他對自己是有一個交代，同時對時代也有一個交代。在他八十歲慶壽的時候，他曾經刊印「八十歲生辰回感」小冊子。他說自離童年時期，他的一生，全部精力，用於兩大目標：這兩大目標

，向來是分道揚鑣，直到最近纔合而為一。這兩大目標，第一是「格物」；第二是用各種努力創造一個更快樂的世界。在三十八歲以前，他的精力完全用於第一個目標——「格物」。他為懷疑主義所困惑，因而被迫得到結論，所謂各種知識，在理智上均可懷疑，因而想到數學的固定性，比其他事理為強。但是許多數學的表露還是充滿着毛病，如果要在數學中發現固定，那將是一種新的數學，所以他的結論，說在此方面已不能再有所努力。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他的思想轉轉移集中於人類的苦難及謬妄。在他看來，無論苦難或謬妄，都非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。因此他深信，除非人類自己毀滅，則智識、忍耐，以及雄辯均可遲早挽救人類為自己設下的苦刑。

羅素先生在他為着第二個目標奮鬥中——為人類創造比較快樂的世界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，在英國反對參戰，其後反對國民兵役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謂反冷戰的和平運動，他受着各種精神上及身體上的責罰。在第一次大戰爆發後，為了散發小冊子對處罰反對兵役者以二年徒刑，加以激烈反對，因而被法庭判處一百鎊的罰金。他的私人圖書館被沒收。在一九一八年，因他一篇發表在 *Tribunal* 雜誌主張和平的文章，被判六個月徒刑。其後在美國教書遭受的磨難，以及二次大戰後因從事和平運動而遭受之嘲罵，更是不勝枚舉。但在他八十歲回憶中，因為根據他的信念，他始終保持着某種程度的樂觀，一般人所說人是生來便有煩惱，他是完全不同意這種意見。他認為現在及過去不愉快的原因，是不難估定的。譬如貧窮、疾疫、饑饉這類的禍患，是因人類沒有充分控制自然。再如戰爭、虐政以及酷刑等，則因人對於同類的仇恨。還有因為陰暗的教條而發生的內心分歧以致世上的繁榮不克實現，這許許多多，都有方法加以克服。在現代世界中，社會上的不愉快都因愚蠢、習慣、信念以及情感——這一大串對若干人們似乎比生命還重要。在這個危險的時代，許多人看上去似乎對苦難與死亡，深為留戀。如果有人向他們建議什麼希望，他們將會憤怒，他們以為希望是不合理的，坐下悲歎與失望，是面對事實。他對這一類人，是不能同意。要在現世保持希望，須喚起我們的智慧與力量，凡是失望的人，常常缺乏力量。

上面許多理論，都從羅素先生的自傳及「八十感懷」中直接或間接引證而來。這許多理念，都是他一生行為的藍圖。因為他的壽命長，他是一個長於思維的學者，他把自己的一生估計與分析，經過他邏輯的淘鍊而十分顯明。他自己評論一生的成敗，回憶在七十五年前於柏林初春大雪初霽時，步行默想，一生想寫作兩套著作。一種是抽象的，由抽象而漸涉具體；另一套是由具體的，而漸涉抽象。在這兩套著作之後，加一個綜合的結論，聯結純理論與實際的社會哲學。除了那個綜合結論以外，關於上述兩個部門他寫了許多著作。這許多著作，受到贊美與推崇，現世許多男女們都受着影響。他認為在這方面在這個限度中，他是成功的。在另一方面，他認為遭遇雙重的失敗：一種是外面的失敗，另一種是內面的失敗。七十餘年前他在柏林初春散步的地方，或已變成一堆瓦礫，或已成為東西柏林對峙的邊界。凡他所認為是善的，已經分別為共產黨、法西斯及納粹連續所挑戰。雖經不斷的應戰，然而原來所持以應戰而思保存的，經過長期苦戰而一併喪亡。自由已被目為衰弱，只有帶着凶殘的信條纔能受到敬畏。這是屬於外面的失敗；至於他精神生活上的永久戰鬥，他對永恒世界的信念，亦漸感微不足道。最初認為自由及勇敢的愛，可以不需戰鬥即可征服世界，他曾為此而苦掙一個劇烈的鬭爭，在這一方面，他認為是失敗了；雖然在此失敗之下，他仍感到有許多地方是勝利的。

反對黨是英國政治中一個特殊的制度，反對主義亦是英國自由主義中一個特色。所謂「不歸順」*Non-Conformity* 由英國的宗教界而傳染於社會及政治。羅素在哲學思想上是一極端懷疑論者，他對許多哲學上已存的理論，都對之懷疑，因而走到數理哲學及數學邏輯的路上去。但即在數學理論方面，他對過去許多舊理論也是同樣懷疑而反對。所以在思想上，他是一個終身的反對論者；而在行動上，直到第一次大戰爆發後方有表現，由此而一直表現到他離開人世。在他九十歲生辰時，他曾說：「我並非生而具有反叛性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，我多多少少與這個世界相處得來。」又在他「八十生辰感懷」中說：「在我少年時代，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，舉世深信絕無疑義。在當時，一般人認為自由繁榮，將由有秩序的程序，慢慢分布於全世界。並且以為所有暴虐、暴政，以及不公道將繼續滅除。

很少有人想到，十九世紀不過是過去與未來野蠻主義橫行的一個插曲。在那種空氣中生長的人，想在現世界謀求適應，是十分困難的。不但是感情上困難，便是知解上也是十分困難。」從羅素先生這些啓示，可以知道他生命上的分界線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也就是在一九一四年。在一九一四年以前，他的懷疑，他的反對，只限在學術思想方面。在一九一四年以後，他的目光，移轉到世界的現實問題。由他的語氣，他對維多利亞時代，是多少帶着留戀的。所以我們在此可以待着第一個結論：他是受着環境支配的人，也可說是時勢造成他的後半生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，維多利亞時代的世界，對一個大思想家能給予滿足，如果把羅素先生後半生的思想及言論來對質，豈非對我們這位哲人是一個大諷刺！固然，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與繁榮誠如羅素先生所說，可以按照和平秩序的方法，慢慢推廣及於世界各地。不過從歷史的眼光看維多利亞時代真是小康中的小康局面，在當時英國國內，政治上的權利是不平等的，工人的福利是談不到的，而所謂自由，至多限於英國的既得利益階級罷了。何況資本主義下面多數數人，又何況被開發被侵畧的海外殖民地。如此等等，對一個懷疑反對的哲學家，可以使他和平相處。於此我們又得到一個結論：照人類的天生情性，要促起反叛或反對，是不容易的。掌握政權的當政，只要做到安居樂業，不為已甚，便可循序漸求進步，要使全國人民做匍匐順民固難，要激起反叛也是不易。天生造反的人，究竟還是少之又少。

一個自由主義的思想家，一個懷疑論的哲學家，照理是不能贊同共產主義的，等於不能贊同法西斯或任何全體主義。羅素先生亦說：「教條式及簡確的傳道福音，如共產主義，在效果上是容易及於深遠。但我不信人類所需要的，是簡確的教條。某種局部性的信條，僅關人類生活某方面的補救，我亦不能傾心相信。」他對爲着保持自由的戰鬥，深歎因爲對各種全體主義的應戰，在持續戰鬥中，把原想保存的東西，一併喪亡。羅素先生是西方思想家最早訪蘇俄的，在他「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際」一書中，他早已看出共產專政的禍害。在他的思想本質上，既反對資本主義，又反對共產主義，但是他拿不出自己積極建設性的主張來。在他「八十年生辰感懷」中所敘述，想在兩大部門的著作後，加一個結論。但終其有生之年，他

的結論仍寫不出。此與湯恩比教授研究一生歷史，十大冊的「歷史研究」，不能得着一個結論，勉強一個結論，是想算宗教來救人類，這兩位英國學人，到頭來證明是一個學人而止，不是一個政治家，更不是大思想家。他們是凡夫，不是聖哲。羅素先生後半生的實際行動，也祇是一個學人的行動，一個書生的行動。他自己只曉得他的主張，在效力上不及共產主義，而不知就從他的行動的方法及策略上講，也是太不講究了。他不是一個革命黨，他對英國現存的政治制度，並無意徹底推翻它。然而他既要從事實際行動，既想整頓乾坤，以他的家庭背景，以他的筆與舌，爲什麼不從現存的政治軌道上去努力。由他競選國會議員三次失敗，可見他對實際政治之疏於政術。在英國的現存政制中，他不去做國會議員，他不去從政黨政治入手，而由社會羣衆運動去實現他的主張，這都充分證明他是一個書生。他自始沒有想搞政治，迫於時勢，赤手空拳，孤注一擲，其志可嘉，而其術太疎！所以論抱負，論理想，他高出英國歷史上一般政治家，而論做法，他只是一個象牙塔中走出來的書生。儘管他的呼聲尚留在英國社會，然而他的績效是微薄可見的。

羅素先生後半生的主張與行動，最主要的是反戰，尤其是反核子戰爭。八十歲以後在倫敦屈爾爾法爾廣場露天演說，抗議核子軍備競爭，乃至反對韓戰，反對越戰，提出以戰犯審判美國總統等等，都是由着反戰的思想而衍出。反對戰爭，在理論上或無可非議的，但問題沒有那末簡單。世界上既然有此事，就必有此理。戰爭也是如此。戰爭完全是由於人類憤恨殘殺的根性麼？恐怕不完全如此。中國有句傳統的話，「春秋無義戰」，戰爭既有義戰與非義戰，可見戰爭不完全是壞的，而且事實上，也極難做到廢止的。戰爭的廢不廢，與多年來爭吵的死刑存廢問題，性質是同樣的。死刑本身是可詛咒，但爲什麼有此制度？進一層的探討，自然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。英國今天是把死刑廢止了的，但國內輿論，多數是反對廢止的，將來的後果怎樣，此時尚難預料。戰爭自然最好是廢止，然而不能廢止，不僅僅是意願的問題。羅素先生晚年爲要實現他的廢止戰爭主張，他認爲韓戰越戰都不應打下去，也不應打起來。以越戰來論，他所得的材料都是北越供給他的，他視胡志明爲越南的救主，他認爲侵略者是美國

，殘殺者是美國，而不是北越。他自己做了共產黨的工具沒有發覺，憑他的聲望，憑他的筆與舌，盡量為共產黨作精神上的助長，這是何等的慘劇與悲哀！東方人講道義與是非，西方人講真，美，善，羅素自己說學生提倡尊榮，美與和善。他有無辨別今天世界上不真，不美，不善，與不講尊榮與和善的，還有超過共產黨的吗？羅素學生對暴虐、殘酷、迫害，口誅筆伐，我今天想起羅素先生於九原而問他，他論韓戰，論越戰，論匪印衝突，他只知道北韓，北越，與匪共，而無視於南韓，南越，乃至對中華民國，在他意念中，一筆勾銷。此在他精神上道德上的暴虐與殘酷，不是和納粹、法西斯，及共產黨的集體屠殺與集中營，同樣的不講人道，不講公義而只看一點現實。納粹、法西斯、共產黨的殘暴猶可說，而所謂大哲學家對世事的精神殘暴是不可想的！

「婚姻與道德」一書在一九二九年出版，這一本書和羅素先生的私生活，在他自傳中極坦白的描寫，引起世人對他不少的誤會和攻擊。尤其在美國社會及學術界，看他是一個不道德之人。第二次大戰時期，他在美國教書為生，紐約城大學原定請他去教哲學，聘書已發而予解聘，卒致涉訟。其後在賓州卑納斯基金會擔任講師，聘約五年，中途解聘，都因為涉及他的道德觀念。羅素先生在自傳中描述自己的韻事，極盡坦白。譬之中國作家，雖李笠翁及袁子才，猶歎不如。在他懷疑派哲學家的立場，世事原沒有什麼了不得。不過世法的社會，自有世法上的禁忌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雖是東方人的道理，但是一個公人，在道德上的修養，是經邦論道的重要條件，中西雙方並無分別。羅素先生本來無心從政，也沒有想實際上做大事。他「求愛」的熱望，至於沉溺放縱，以為無關他人，而不知既想救人救世，這一點修身起碼條件，是必須遵守的。羅素先生自己常常悲歎人生的寂寞，尤其他個人長年寂寞的痛苦。這在東方人看來，一個大儒，不能耐寂寞，那能成大事，耐寂寞是成大事的起碼條件。黃梨洲說一個人不能耐寂寞，終將無所不為。羅素先生可惜沒有懂得這個道理，他談中國，勸襲一點老莊皮毛，真為通人所笑。他所夢寐留戀的維多利亞時代，他所並不重視的自己家世，都不容許他放浪至於此極。在他自傳的書札叢刊中，有一位美國友人寫信給他，說如果你在道德方面，與你的學問文筆，

有同樣的成就，那末你轉移時局，喚起人心的力量，真有如山嶽那樣的重大。可惜三次離婚，四次結婚，給人們的印象太深了。人世間許多事，是不能兼有的。極淺近的說，要做名士，便做你的名士，要做達官，便做你的達官，不要妄想達官兼名士。再高遠一點說，做大儒又要做名臣。三不朽事業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都想一身兼而有之，真是談何容易。而且由東方的道理，修身而后齊家，家齊而后國治……。要想度人，先度自己。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規範，那容許像羅素先生的放浪形骸。我們忠恕之論，他後半生的行動，不是他當初所預備做的，自傳中云云，我想是後來加上去的。他本來的志業，是想做一個學人，擴而充之，做一個思想家。

民國九年夏天，當他到中國訪問的時候，我那時還是一個中學將畢業的學生。那年暑假前，上海熱鬧極了，杜威與羅素，相繼到了上海，舉行一連串的演講，地點在上海西門教育會。替杜威做翻譯的是陶知行，替羅素做翻譯的是趙元任。一個中學將畢業的學生，聽兩位西方學人的演講，當然不得要領。當時為了崇拜西方學人，居然每日去聽講。十年後到英國讀書，每年冬天費邊社安排的名人演講，要購門票方得入場，每年均有羅素先生。那時候起，我開始喜讀他的著作，他所有的著作，除了講數學的幾部書外，我大半看過。他的學問真是博大而精深，他的西洋哲學史及「自由與組織」「權力」「權威與個人」等書都是我欣賞的書。他的著作，不但內容博大精深，其文字的清麗，尤其吸引力。譬如在中國，他是杜佑馬端臨陸宣公蘇文忠一流人物。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文人，不安於做文人，做了文人要想立功封侯，以致一敗塗地。羅素先生如果安於做一個學人，安於做一個哲學家，他一生過的日子，要舒服悠閑多了。他在學術上的貢獻，一定更豐富了。他不安於做一個文人，不是想立功封侯，而是想救人類救世界，抱負氣概是高人一等。為了他的抱負氣概，他的後半生，歷盡風波挫折，然在他絕無怨言，這是可以敬佩的。我說他對自己有一個交代，對歷史也有一個交代。一切是自己主觀的事，自己滿足了，何必多管人家的評論。羅素先生是英國自由民主制度下面一個飽學而有志的人，他自以為他的思想行為超脫了國界。但歸根還元，他還是英國的產物，帶着濃厚英國文化的文化騎士！